**《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读书笔记**

引言 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1

第一部分 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 **2**

一、欧洲领先于亚洲人?—资本积累和技术对欧洲发展的解释2

二、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 6

第二部分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 10

三、奢侈消费和资本主义的诞生10

四、看得见的手: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 12

第三部分超出斯密和马尔萨斯之外:从生态制约到工业持续发展 14

五、共同的制约：西欧和东亚的生态紧张14

六、土地制度的解除：作为一种新外围的美洲 16

基本观点：本书讨论了各家的论点，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本书的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在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 引言 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

（一）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欧洲为了弄清什么造就了西欧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而做出努力，但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结论。这些解释包括：

1.欧洲机器化大工业的早期发展；

2.用某种公式说西欧有推动工业发展独一无二的因素或避免了一些障碍；

3.突出欧洲和世界其它部分的联系，特别是殖民剥削的不同形式，但这种观点过于强调“原始”残忍的积累，且欧洲人储存的自己的农场，工厂和店铺收入中超出维生水平可以用来投资的剩余有着缓慢但明确的增长，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本书强调对非洲人的剥削、海外资源的普遍利用，但不是欧洲发展的唯一动力。

尽管海外统治高压、有助于解释西欧和东亚国家现象的差异，但也有诸如煤矿位置的因素。本书把比较分析、某些单纯的地方性事件以及一种综合性的或全球性的探讨结合在了一起。

（二）比较分析和综合探讨有制约之处

1.西欧与印度活动欧区分开来的因素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就不是欧洲差异性研究

2.欧亚大陆共有的模式也不能解释欧洲文化或历史独有的产物

这些相似之处，迫使使用一种单纯的比较，即使用各个离散的社会作为比较单位，向一种同时着眼于全球性关联的方向转变。如果我们以欧洲为世界级体系中，就无法理解1800年以前的世界关联，我们有的是一个多中的、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中的世界。全球关联利于西欧，但并不一定是因为欧洲人创造了这些关联或施加了影响。

（三）现有的大部分著作一直被限定在一个非此即彼的框架中，或是用一个以欧洲为中的世界体系，进行了必要的海外原始积累；或是用所谓欧洲内生发展，解释几乎一切现象——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后者，在三方面加强了这种排他性的内生中：

1.西欧在开始海外扩张之前，就走上了独有的前途宽广的发展道路。强调现代西方与它的过去、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当近期著作试图缩小第一条鸿沟，暗示“欧洲特殊论”第二条鸿沟可以追溯甚至比我们想到的更早。——本书一个中论点就是，人们能够同样容易找到根据，缩小18世纪的西方与至少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方之间的鸿沟。

2.市场动力越是出现在想象中抱有敌对性的中世纪文化和制度中，月引诱人们把市场驱动的增长当做欧洲发展的全部历史，忽视细节、政府政策和地方修造成的影响。——若国内的法令只是一条小路或捷径，为什么海外（远离历史主流）压迫值得更多注意？

3.由于这类商业化进程涉及到了前工业时代西欧的许多地区，最近很多著作把与工业革命相关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作为一种欧洲现象，而不是像通常习惯的那样，作为一种后来传播到欧洲其余地方去的英国现象来对待。——这种叙述降低政治重要性，是西欧内部差别更容易最小化的倾向。

用“欧洲奇迹”代替英国奇迹有重要意义。再度使欧洲以外的联系显得不那么重要；

欧洲中论的各种变体:人、生态和积累

认为唯有西欧经济才能产生工业变革的观点一般分为两大类：以E.L.琼斯著作为代表，认为在一个类似于“前工业”的外表下面，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的积累都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余地方。论据：对生产力的各种习惯性抑制避免人。增长几乎吞噬了生产增长的全部成果。

因此，普通农民、手艺人和商人的人、行为及经济行为的差异创造了这样一个欧洲：可以供养更多非农业人，使人民得到更好的工具（家畜等），更好地营养、更健康、更有生产力，并未查出单纯生活必需品范围的商品建立一个更大的市场（约翰·哈依纳尔）。不过，最近对东亚部分国家出生率、预期寿命等研究，是这种独特成就显得越来越普通。

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但最近新发现的一个人。对历史的驱动作用的重要意义中，已经被不分了解：即承认在欧洲以外的前工业环境中，存在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事实总被当作昙花一现）。

这些著作或明或暗地认为，在现代早期欧洲取得突破性成就之前，全世界都是贫困的，只有最小程度的积累，使学者注意到欧洲的崛起与亚洲的衰落，但这些看法存在错误：

1.把太多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困扰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生态学的灾难和人。密集造成的问题强加到早期阶段，认为亚洲在18世纪已经把一切可能的潜力消耗殆尽。

2.把欧洲从新大陆获得的特别的生态恩惠（缓解欧洲本身生态问题）“内在化”，甚至认为是“正常”的边境扩张模式。忽视了新大陆这笔意外之财的特殊规模，忽视了殖民地特殊的强制性特征和生产结构，忽视了保证欧洲人在美洲扩张成功的全球行动力的作用。

为了改变对“亚洲的衰落”和欧洲享受“落后的好处”给人的深刻印象，因此第五章对中国和欧洲挑选出来的重要区域做了一个生态制约条件的系统比较。

本书与杉原熏研究全球发展的著作中的一些论据相同。杉原熏强调1500-1800年间东亚人。的高增长率不应该被视为阻碍“发展”的病态，相反是一个供养人。、创造技能等等的“东亚气急，完全可以媲美工业化的“欧洲奇迹“。还强调从长远看，正是一个西欧与东亚国家发展类型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西方成就的传播，对世界GDP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杉原熏认为，这两种契机的基本差异是早在1500年西欧就走上了一条资本密集的道路，而亚洲国家为劳动密集。本书与他观点相反，认为欧洲本来也有可能走上劳动密集道路，原因是原油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急剧断裂——以矿物燃料该大陆资源的利用为基础，共同作用，避免了密集使用土地的必要性。而在中国和日本，1750年以后的人。增长严重集中于不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可以通过与资源饥渴的该区的贸易“释放”的鼓舞、木材、原棉和其他土地密集产品的剩余较小；由于这些外围地区增加的人。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原始工业，更少需要与该地区进行贸易。而在欧洲，已经相当发展、人。相对密集区域在1750-1850年间人。大规模增长。第五章和第六章将更多地讨论这些差异的政治-经济和生态基础以及它们对工业化的意义。同时，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并不是那种能够发硬东亚（更不必说南亚）经历了比欧洲更严重的全面资源紧张的差异。然后，让我们从对可利用资源数量的讨论-无论是已经积累起来的还是未经使用的-转向那些认为欧洲制度分配资源的方式更有利于长期自我支持的发展的观点。

## 第一部分 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

### 一、欧洲领先于亚洲人?—资本积累和技术对欧洲发展的解释

欧洲怎样在19世纪中叶成为唯一富裕的区域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艾克里·琼斯的《欧洲的奇迹》或许是对主流最接近的阐述。工业化并不是欧洲经济史脱离旧大陆其他部分发展轨道的分界点，相反，它表现出了此前几个中世纪中已经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各种差异的充分成熟。该观点的解释为：欧洲人在工业化之前单独富裕起来，有多得多的资本，特别是牲畜，供他们支配。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使欧洲人可以保持他们的消费水平略高于亚洲人；此时，他们的积蓄资产比较不易受破坏，因为欧洲经历的自然灾害较少，并且比其他地方更早开始使用耐火的砖和石头作为建材。

农业、运输和牲畜资本

与其他大部分定居社会相比，欧洲人均拥有的牲畜确实比较多，并且在一个牲畜构成一种极有价值的固定资产的欧洲耕作体系内，耕畜越多通常意味越兴旺。在亚洲一些地区，牲畜的短缺也的确阻碍了耕种更多的土地。在其他一些亚洲社会中，人。数量达到限制牲畜的有效利用率的程度；但在那此例子中没有迹象能说明耕畜的短缺抑制了农业牛产。当然，耕畜也可以驮拽其他重物。

在亚洲也看不到运输资本短缺的其他迹象，这样一种短缺应该会抑制流通，特别是像粮食之类体积庞大的货物。在人。最拥挤的所有社会之，中国，进入长距离销售的农产品比例看来可能比欧洲高很多。吴承明保守地估计18世纪有3000石粮食进入长距离流通应或者说是足以供养1400万人这个数字是对1800年前欧洲粮食长距离贸易的顶峰的一个宽松估算的5倍多超过波罗的海地区在其全盛期一个正常年景粮食贸易量的20倍。除了中国,亚洲各地许多城市等严重依赖长距离运输的大量粮食。很难发现欧洲存在运输优势的证据。

一个最后的可能性是，欧洲的牲畜在为工业活动供给动力时产生了重要的差异，例如转动石磨。但亚洲以稻米为主食的区域并不需要以磨粉为起点，因为水稻（与小麦不同）通常用不着磨成粉就可以食用。因而，一般说来并不需要大量的牲畜，也没有迹象显示畜力短缺成为任何地区工业发展的明显阻碍

所以如果欧洲的牲畜构成了一种差距，它也不是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而仅仅作为一个消费项目：但在现代早期阶段，这一优势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而且下降得很快，例如，中世纪晚期到1800年间，德国的肉类消费下降了约80%应此外，肉类并不是一种不能取代的蛋白质来源，很多中美洲人和北美洲人看来是从玉米、豆类和南瓜中获取肉类中最重要的氨基酸的，东亚人则从豆腐中获取。更一般地说，任何以一类食谱或者一种别的特点，如有较多的砖石建筑为基础的观点都是不牢因的。

寿命更长?生活更好?

在1650年的英格兰（或许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预期寿命也只有32岁左右；1750年以后才超过40岁。亚洲的不同人群看来至少与西欧人有同样长的寿命。根据估计18世纪末19世纪初，日本两个村庄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中值男性分别为34.9和41.1.女性为44.9和55.0。中国人的长寿给人的印象不那么深，但仍然完全可以与欧洲人的寿命相比较。东南亚的资料极为参差不齐。证据显示，1500到1800年间，东南亚上层阶级的寿命可能略干扰他们的欧洲同类。只有在印度找到的预期寿命估算值才明显低干西北欧的大部分数。1800年前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在20到25岁之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劳动力体系的种类甚至比面积更大（但政治上更统一）的中华帝国要多得多，其种类的范围看来至少像欧洲的一样广，因而比仅有西欧自身时大很多。如果这种情形导致甚至在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区收入分布和生活条件存在同样巨大的差异是不会让人吃惊的。此外，一项最近的研究认为，18世纪中叶至少印度南方工人（农业—人和手工业工人）的食品购买力普遍超过了英国工人阶级。

出生率

如果欧洲人的死亡率并非特别低，他们的出生率也不是，因此欧洲家庭在保持他们的世袭财产方面就没有特别的优势。

日本的资料首次显示出令人吃惊的低出生率。其中有许多看来是习俗安排的间接的或许是无意识的一一结果，按习俗，年轻女性通常一次数年离开她们的家乡做雇工，因而对出生率产生了与哈伊纳尔在欧洲看到的类似的（尽管更明确的）影响。此外，我们也不会弄错控制一个家庭中儿童数量和性别的更为直接的人为努力的证据，包括流产和弑婴，或许还有避孕和节欲。更有启发意义的是，已经越来越清楚这些直接的手段包括弑婴不仅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作为一种生存策略，而且也是繁荣时期积累和迁徙策略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有证据证明日本宫人中的弑婴行为实际比穷人中的更为普遍。

来自东南亚的证据较少也不大引人注目，但也强烈地暗示出夫妻们进行了多种努力以控制出生率一特别是很多有女性从事小贩工作的家庭。就在最近已经弄清楚，不同阶级的中国家庭无论是在顺利时还是在困难时都会采取多种方法限制他们的家庭规模，拉开其子女的间隔，选择子女的性别。最广泛使用的方法看来是在婚后推迟圆房时间，从而避免在建立一个家庭后立刻怀孕，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使得中国女性尽管实际上普遍早婚其生育期间平均看却比同类型的欧洲女性明显缩短巠结果是，在1550— 1850年这整个时期中，每个婚姻和每个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西欧的水平。

总之，显然亚洲的不同人群至少像任何欧洲人一样能够也确实为维持或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作出保持低出生率的决策此外，中国和日本的出生率比欧洲低的证据也支持了死亡率较低（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当高的生活水平）的证据，反之亦是如此。

积累?

迟至1750年，惟有大部分欧洲人—甚至西北欧人—才是富裕的。所以，既然欧洲人的积蓄资产看来并不能使他们为自己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它们也就似乎不可能有更高的价值。然而，琼斯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一欧洲的积蓄资产贬值较少—值得单独注意。可能有这种情况：一种更为耐用的积蓄资产在长时期中会被其他差异抵消（如较低的总投资或缺乏熟练工人）但当这些其他的差异不重要时，它会逐渐使自己的衰减变慢。尽管如此，目前看来没有理由把更多的重放在任何这类情况上。

欧洲的建筑可能比中国和日本的建筑更能经得起风雨侵蚀，后两个国家使用砖和石料都比较少。然而，我们缺乏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欧洲在这方面领先于所有其他社会，或在积蓄资产这一已有的弱点中没有其他补偿性的差异

琼斯还认为，欧洲最常见的灾祸—主要是流行病、战争和农业歉收—主要破坏劳动力而不是资本，而在亚洲很多地区比在欧洲更为常见的地震和洪水则更可能破坏资本但是再一次，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能使欧洲获得任何明显的优势。确实，除了最严重的灾害外，人。通常经过一代或两代即从所有的灾害中恢复，而积蓄资产的某种毁灭性的影响持续时间却较长：在13世纪的战争破坏了灌溉系统之后，伊朗和伊拉克的衰退长达几个世纪，可能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但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被破坏，即使是重建费时费工的基本设施所花费的时间，通常也不比人。从流行病中恢复所需时阁更多。如长江流域的治水系统，在17世纪连年的战争、瘟疫、萧条和人。下降之后，且恢复稳定，重建得相当快。在19世纪中期绝对水平同样高（尽管不是同比例）的破坏之后，也仅在几年内就得到了恢复。最后，琼斯没有提供能使我们相信置换被毁坏的物质资本比置换人力资本必然更为困难的理由，而欧洲的人力资本看起来至少与中国、日本或东南亚损失得同样快。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洲的农民或其他工人比他们在欧亚大陆各地的同行有明显更高的生产力—就像当他们有更多或更好的资本时，他们本应该的那样。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寿命更长或生活更好—这一事实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还由于它暗示出在欧洲和亚洲的商品竞争中，所以如果他们的工人有较高的生产力，他们就应该能够在亚洲市场上出售其产品。但是，正如所有的记载一致同意的，欧洲商人在亚洲出售他们的商品要比在国内为亚洲商品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的消费品一一寻找市场困难得多。

确实，亚洲输往欧洲的制造品的最大单一产地印度次大陆—也是很多学者认为其工人生活水平异乎寻常低的一个亚洲大区。但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时间中，中国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也得到了个重要的欧洲市场。

技术又如何?

从整体看18世纪的欧洲人比中国人或日本入更有生产力看来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需要谨慎地为1750年前后全欧洲“科技优越＂的主张下定义。结论承认文化和制度因素在帮助某种“科学文化”传播方面的重要性，但是留下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这种文化怎样成为独一无二的。它们也倾向于把其他许多学者重视的比较具体的政治一经济因素作用（从专利法到与英国劳动力高成本连绵不断的冲突）减到最小。同时这样的结论增强了从海外得孕的某些关键性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增强了一系＂列与地理和可用资源相关的“随机因素”的重要性。

在很多领域中，各种各样的非欧洲社会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灌溉或许是最明显的，在其他很多农业技术中，欧洲也落后于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由于欧洲19世纪转向了可以利用的丰富的矿物燃料，欧洲人在寻找利用热能的方法方面的进步与中国在有效捕捉热能方面的进步相比，具有了更大的革命性的潜能。西欧不仅没有在所有技术领域中领先，且在它们确实领先的那些领域中，也只有一些有长期意义。例如，到那时为止，西欧有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水车但仅此并不能使利用水力的欧洲工业部门获得竞争优势、有能力克服高运输成本（或生产过程其他方面的高成本）并征服其他地方的市场。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种只能在数量有限的地点确立的优势，并且即使在那些地点它也不能无限扩张，其他许许多多技术成就都是如此，无论是产生于欧洲还是别的地方。

欧洲技术创新中出现了对节约劳动的强调，这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经济差异（基本要点是西欧劳动力是自由的，并且据说挣相当高的工资）促使欧洲人（或者在这一观点的某些版本中是英国人）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节约劳动的发明中，而其他社会几乎不注意或者不需要节约劳动力，最后导致了机器和现代工厂的出现，以及人均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而同时其他社会更感兴趣于寻找能够节约土地、资本或某些具体的稀缺原料的创新。所以，欧洲人并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高工资成本促使他们的努力走上了一个导致真正变革的方向。除了或许一两个具体工业部门外，这一观点并不起作用

首先是经验的问题。看起来甚至在18世纪晚期，日本、中国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平均收入可能与西欧的差不多，所以工人在一个大致相同的一般人均收入中得到的份额高于别处的工人，这一可能性是可以理解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社会可能存在一种非自由劳动的体系，这样一来，即使工人的劳动得到了相当高的总报酬，但他们没有为较艰苦的工作得到追加的收入，当他们的庇护人没有生产性的工作给他们做时，他们也不能寻找其他工作。在这样一种设定中，尽管看起来是高工资，但对于精英们来说，尽力从他们的下属中取较多的劳动时间，比投资于节约劳动的技术会有更大的意义。

后一种设定完全可以说明东南亚某些地区的状况。有高度技巧的手艺人，尽管人数稀少至他们常常可以得到很高的工作报酬，但却从属于“保护”他们并且独占他们产品的贵族庇护人它也可以适用于印度供一些地区，但那里形式上自由或半自由的手艺人似乎更为常见，至少在英国统治者针对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定法律之前，织工在面对那些为他们预付流动资本的人时习惯上是保持自治的。这样一种模式甚至在1400年代就已不适用于中国大多数的手艺人，实际上当政府指定的工匠世袭制度在1500年代崩溃后就不再适用于任何人，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著到的，中国的劳动很可能要比欧洲现代早期的劳动”更自由“，肯定不会更不自由，依附劳动初看起来可能更适合于德川时代的日本，人们推测，当时各种各样的职业法规、对迁移的限制、世袭的庇护人一托庇者关系都由法令固定下来准如同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事实是与法令全书全然不同的

即使我们暂时接受西欧人的工资比任何亚洲人都高的观点但要推论这种情况会刺激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仍然存在疑问事实上在现代早期的条件下一般而论，高工资能够阻碍技术革新就像它能够促进节约劳动的发明一样容易。

此外，尽管最近两百年的上业化总的来说是劳动的节约和对资本的需求，假定这始终是重大的发明创造的理由仍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煤和蒸汽在各种各样工艺过程中的应用最终导致了巨大的劳动节约，但18世纪那些使煤可以用于生产铁、玻璃、啤酒等等产品的发明创造，其目的却是节约燃料费用（煤比木柴更廉价）而不是节约劳动。如果工业革命的缔造者们首先节约了昂贵的劳动，他们也是无意识的。

### 二、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

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

自然，中国和西欧在空间和时间的跨度上都有很多变化，但在 16 世纪到18 世纪之间两者都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朝着马克·布洛克所谓的“农田个体性”发展，总的说来，中国比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更接近于市场驱动的农业。

中国各地绝大多数的土地或多或少都可以自由转让。由于应该世袭的佃户出售或抵押土地，并在后来政府试图让他们为土地正式脱离官田地位而付款时愤怒的抗议（并得到了成功）。这类土地中有许多最终无论如何都是被作为私有财产对待的，有稍多的土地由于处于私有“善产”地位而不能转让。此外，即使在不可转让的地产普遍存在的地方，也不清楚它们的用途与其他土地有任何差别。习惯法通常规定土地应首先出租给亲戚或同村人，在宗族关系特别强大的华东南，亲戚通常可能确实限制了土地潜在的买主和租户尽管由于许多亲族相当大，甚至“亲族优先＂的惯例也允许许多人对任何具体地块展开竞争。另外, 20 世纪一些接受调查者报告说，亲戚和非亲戚可以以同样的条件租种宗族的土地。但是，即使我们对这些关系持最悲观的看法即租佃权无保障和高额地租使佃农在进行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时处于弱势地位 我们还需要记住两个要点。第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能采取改良措施是日益强大的市场的结果，而不是“惯例”造成。第二，我们正在涉及的最多只是耕种者在投资于土地改良时面对的附加风险无论如何很多人显然选择了继续进行改良，我们到处都看不到习俗权力使有其他意愿的农民不能进行改良。

西欧农田中有许多远比中国的农田买卖困难。 甚至在 19 世纪，英格兰全部土地中 仍有约 50 %由聚居的家族占有，这使土地几乎不可能被出售。法国限定继承权的地产较少，但并不缺乏这类惯例。尽管 1 7 和 18 世纪西欧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真正自由的土地市场—荷兰、伦巴第和瑞典—但仅英格兰和西班牙限定继承权的地产在西欧土地中所占的比例就比中国不能进入市场的土地比例大很多。世袭租佃关系使小块土地的合并极为困难，如果没有这种合并，圈地的耗费就太大而用处又太小。而圈地对19 世纪晚期以前欧洲农民能实行的惟一最重要的技术变革来说是必需的。

劳动体系

如果说西欧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与众不同的效能，它的劳动市场又如何呢？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自由劳动”问题是怎样与经济效益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的。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与不自由的个人相对，在于控制了不自由劳动者的那些人要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否比他们在自由的条件下会从事的工作生产力更低。他们特别可能迫使这类人坚持做相对非生产性的工作，这些工作似乎只有对一个领主才值得做，因为对后者来说，一个依附劳动者增加的劳动时间没有要用现金支付的边际成本，同时完全可能有一个人为压低的机会成本。如果依附劳动者一日得到解放会实际转向某种更有生产力的工作，则这种强迫劳动制度就确实压低了总生产力，这是一种设定，在这种设定中，举例来说，从“改良”地主的地产上被驱逐出来的以前的依附佃农成为新工业部门的劳动大军。但由于新的工业部门很少能突然发展，这样一种情景通常是长期性的。

在这期间，很多这类劳动者可能失业，总产出可能会由于原有的对产出有一定贡献的工作停止而下降，即使这种贡献并不足以证实支付一笔最低生活工资是值得的。因此，在短期到中期阶段中，不自由的劳动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总产量。

这些问题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依附劳动关系中：奴隶、农奴及其他等等。一些学者用同样的方式分析了农家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由于家庭成员无论如何都要吃饭，他们挣到的任何数量的收入对全家都是一个纯增长，即使这种劳动挣到的隐含的计时“工资“低于维生水平。一个广泛存在这类劳动的喷卷的“社会完全可以呈现出很多与一个典型的奴隶或农奴社会同样的经济（如果不是社会或情感）特征：劳动极度密集的技术使用、非常小的外购生活消费品市场、对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极端缺乏兴趣。我们将首先考虑把人们束缚于非亲属关系的制度，之后再回到家庭劳动上来．

学者们对于奴隶劳动在中国何时失去经济意义没有一致意见。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力求完全保有对臣民的权力，可以对其征税并直接征兵，不必通过地方豪强势力，但政府并不总能为所欲为。在其他地方，依附劳动普遍在更早的时候失去重要性。例如在华北，很多农业工人 在明代地位低于其他平民，但他们并不束缚于土地。到18世纪后期，甚至在既不由田 主也不由佃农劳动耕种的，在总面积中占比非常小（不到10 % ) 的土地这类劳动者也相当少见。华北佃农和农业工人面对的最后的法律障碍在1780年代消失，约与西欧同时，但也那之前很长时期它们就只对极少数的人起作用，有一些特殊地区安徽省徽州地区特别显著。

到1500年，成熟的农奴制在易北河以西极为少见，所以大部分农民可以合法地结婚、移居和拥有土地，而在 18世纪的法国甚至仍有一些农奴存在；强迫劳动和隶农制在丹麦城邦也仍然相当重要。此外，在法国和西德，多种多样的封建权力和限制仍然存在，通常包括领主垄断谷物磨坊、农民的服务性劳役、领主对地方司法的控制：这些权力必然使很多农民在主张他们的任何权力时踌躇。甚至在19世纪初的英格兰，隶农制已消亡了几百年，济贫法仍然规定，只有居住在其出生地的教区的人才符合救济条件；这使很多人甚至短期移居也要留入大的风险，从而使他们成为附近几个甚至一个大地产的不能自由行动的劳动后备军·"'在欧洲境内的远距离移居受到各种法律屏障、语言差异和其他障碍的极大阻碍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比中国的远距离移居受到的阻碍大得多。

迁移、市场和制度

可以设想贫穷的劳动者（如果他们都能够迁移的话）会向两个方向之一迁徙，向土地与劳动之比较高的地方（典型的边疆）或向资本与劳动之北较高，并且有建筑业、服务业或制造业工作的地方（通常是，但并不总是城市）。然而。多种多样的规章制度（通常被总称为“庄园制度”、“封建主义”或“二次农奴制")使得极少数人能 通过向东方迁移改善他们的状况，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一种较为不自由的法律地位和对他们立桩标出的任何土地的不明确的权力。尽管按照给他们以可靠的法律地位的专门安排，确实有一些自由的德国人移居到了俄国和普鲁士、荷兰 人移居到了立陶宛等等，但这都是例外。总之，向东方比较空旷的有潜力的肥沃地区的移居规模。无论是与我们在一个想像中统一的欧洲应该校期的情况相比。还是与中国在同样大的空阁跨度中实际发生的情况相比，都是非常小的。总说的来，填满这些地区 必须等到 19 世纪出现巨大的法律变革和东欧自身的膨胀。

在向新大陆移民方面（与东欧不同），相对于穷人的工资和储蓄来说，移民的高成本大概是一个比任何法律问题都大的障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人只能通过接受契约劳役来满足这些移居的费用。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通常包括提供旅途费用、举办贷款、贷放种子、帮助获得耕畜、提供基本信息等，单只是 17 世纪后期和 18 世纪，前往中国不发达地区的远距离移民 就轻而易举地超过了 1000 万 人。因而，看来可能的是，中国的移民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对区域性的劳动力过剩确实比欧洲移民了得更清楚。另一方面，向资本充裕的地区移民在欧洲可能更容易，在欧洲资本最桸缺地区（如俄国）的居民可以肯定相当稳定；如我们看到的，像英国济贫法这样的制度甚至可能人为地抑制从英国一个贫穷的教区移居到伦敦（或后来的曼彻斯特）。但17和18世纪确实有很多欧洲人从短距离到中距离向改区域迁移。

欧洲的制度可能更有助于把人从劳动剩余的区域转移到资本充裕的区域，从而（在理论上）创造出均衡的移民运动。中国即使没有习俗的阻碍，政府也没有鼓励向土地的移民，大规模的趋向于资本的移民也是难以想像的，毕竟在欧洲，制度对追求土地的干预相当多，对追求受雇于充裕资本的干预则非常少，但趋向 18 世纪的职业的人。潮流仍然相当小，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向资本充裕地区移居的习俗障碍，在 18 世纪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是像我们描述过的对欧洲土地追求者的障碍一样严重的缺陷。当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欧都不是一个运行平稳的新古典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中国可能多多少少更接近于这一模式而肯定不是更远离它就已足够了。

农产品市场

在市场上出售大量产品的农民至少比伦敦和巴黎周围他们的同行遇到一个独家垄断的买主的可能性更小。在英、法两国，渴望以几乎任何代价补充其资产的君主们允许一种“私人市场”的发展，商人越来越直接地向农民购买谷物，以一对一的交易方式阻止了谷物随时进入一个实质存在的市场场地，而在那里卖主可以考虑由数个彼此竞争的买主提出的价格。如布罗代尔所强调的，这种交易—其中商人一方有对市场的高度了解和现成的金钱—"天生的不平等”，通常会导致一个使农民永久欠债的自我循环，并使一个人无法选择在什么时间把自己的产品卖给谁。

相反，清政府非常关确保地方市场的彼此竞争的买主和卖主。有很多证据显示，这种制度一般（尽管井不总是）针对粮食和棉花，它们构成了农产品出售的大部分。的确，商人确实常常利用贷款来保证得到他们想要的农民产品，不过农民佷少丧失他们选择向谁出售产品的能力。

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

由于政府官员分发棉花种子，出版指导书籍，鼓励传授相关的技术，把男 耕女织”的分工推崇为巩固家庭的基础等政策，到 16 00 年代初，长江下游几乎所有农村家庭都从事某种为市场的纺织工作。华北的很多地方连同岭南在 17 和 18 世纪跟了上来，长汀中游和其他地方也发展起了一些重要的生产小区，在那些当地生产没有发展的地方，正是由于缺乏合适的地方资源，加上从较为发达区域输入的手工业品，使其停顿。

西欧的城市行会也失去了对纺织品生产的控制。尽管利用农村劳动力有明确的成本优势，城市中的手艺人却普遍赞同赋予他们的特权以合法权力。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农村工业确实有明显发展，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把限制性的行会制度也强加于农村，在这些地方，农村和城市的行会常常为成功地抵制技术变革而（在政府支持下）共同行动，奥格尔维研究了德国的档案后得出结论说，原始工业发展和集团特权的这一制度性遗产在 19世纪仍对经济和社会构成一种直接而待久的障碍。

然而，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列举对一个理想化的整合的劳动市场的偏离现象；那些偏离现象可以在仔何地方发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有意义的劳动市场。尽管如此，通过欧洲的一些案例，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结论性的计量，这些计量显示出劳动市场的整合相当有限而不连贯。

对于为什么部门间和区域间巨大的并不断发展的工资差距在欧洲进入工业时代后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学术界没有一致意见。解释无疑是多样的包括了很多不能够认为是劳动市场“缺点”的因素。尽管如此，学术界普遍承认这种缺点在使工资差距长期存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权衡一种解释的不同构成时，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在这里再次面临需要解释欧洲对斯密型效应的巨大背离既在现代早期阶段又在工业时代本身出现我们在东亚没有看到与这种背离近似的情形。

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内卷与勤劳革命

黄宗智认为，清代中国的经济仍然以一种西欧没有的方式“内卷”。黄认为．产量和交易扩大依靠的是不断投入更多的不付报酬的家庭劳动，每单位劳动的收益很小（并且不断萎缩）。这种收益帮助家庭满足了或多或少固定的消费需求，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低利润和接近于零的绝对工资结合在一起，使投资于节约劳动的机器失去意义，把人们拴死在低效率的工作上，只给“非维持生计必需的产品”留下一个小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工业能够发展，但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因此，“这是小农生产和生存的商品化，而不是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气成为这种动态基础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妇女几乎被排除了户外劳动冲这些约束鼓励家庭把妇女劳动作为无需花钱的劳动对待，很像一个庄园无论其工作是多是少都必须养活的奴隶或农奴的劳动。

暂且假定黄宗智对中国的描述是正确的，它与 18 世纪晚期以前的西欧有多少不同？欧洲也有充足证据证明，1500到18 00年间出现的生产扩大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更大数量的劳动，而不是已于任何生产力的突破；这一趋势如此普遍、基本和持久，以至简·德夫里斯提议我们把这一阶段重新概念化为“勤劳革命”阶段。通过对西欧证据的列举，如法国，英国，德国人均消费和相关研究，以及中国西欧对比，作者得出无论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水平还是劳动投入都没有证明存在一个与“勤劳”的欧洲相对的“内卷”的中国，对有更具体意义的家庭动态和劳动的了解也没有证明这一点。也不能根据产出或消费模式断言是中国还是西欧经历了更多的“勤劳革命”，包括家庭劳动的扩大及其堇新配过和节约时间的消费的增长一或者哪一个地方出现了某种更接近于纯粹的“内卷”的事物，看来最安全的是把两地放在同一范畴中，并承认欧亚大陆两端劳动市场、节约时间的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

生产决策和劳动配置

对女性劳动的比较也没有明显表现出欧洲更“革命”而中国更“内卷"。对妇女在户外工作的文化抵制因素在中国比在欧洲更强烈，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欧洲女性出售其劳动的市场比中国女性出售其自制产品的市场更自由。中国妇女很少自己出售或支配她们的产品。她们普遍受丈夫或婆婆的监督，后者相当强词夺理地降低她们的休闲时间的价值，甚至在追加劳动的报酬下降到完全低于市场工资后还要她们不停了作。然而，更多的欧洲妇女直接把她们的劳动出售给非亲戚并不意味着她们不会在家庭内部同类权力的逼迫下，出售比她们愿意出售的更多的劳动（包括家务劳动）。

中国的“内卷”程度完全可能低于西欧。黄主要依赖的是18世纪河南工资合同的一个调查，但并不具有代表性。妇女在更为庞大的棉纺织部门中的收入也高于“”卷化”水平。

总的看起来，在中国，劳动利用像土地利用一样，至少与欧洲同样符合于“市场经济”原则，可能还多少更好一点：“勤劳革命”看起来至少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是共同的。当然，在现代早期阶段整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欧洲制度，与中国的情况相比，有可能使某几种狭隘但重要的行为的报酬与这些行为对经济做出的贡献更匹配。例如，似乎有理由认为，18 世纪英格兰专利法的发展使发明家得以获得与他们的全部工作价值更接近的报酬，因而可能 对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产生影响。但即使这是事实，这些证据也只是在我们所研究的阶段的末期才有意义。即使是那样，我们也需要记住，19世纪中期以前，西欧经济中得到新技术改造的部分是多么小，即使是最为重要的创新又是如何依赖欧洲以外的事件和关联才能实现其革命性的影响的。因而在发明市场上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方面的差异太狭小，不能解释1830年以前欧洲可能存在的经济领先地位。

第一部分的结论: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多重该和共同制约

这部分检验了很多强调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在生产力方面存在内生优势的观点，并发现它们都存在疑问。西欧的人尽管是独有的并没有形成更好的生育控制，西欧人的寿命也不比其他不同区域的人更长。没有什么东西司以显示出西欧的积蓄资产明显更多或具体化为决定性的全面技术优势，其土地和劳动要素市场看起来并不比中国的市场距斯密的自由面有效的市场理论更近，或许还要远得多。此外，倍受诋毁的中国家庭劳动利用模式，在经过更严密的考察后，看来与西北欧模式同样可以对变化中的机会和价格征象作出反应。因而，西欧最发达地区远非独一无二的，它们看来与欧亚大陆其他人。密集的该区域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商业化，商品、土地与劳动的互相修正，市场驱动的发展，家庭根据经济趋势对其生育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相反，所有这些该区域都是在一系列不能只靠市场解决的基本的技术和生态限制下，主要通过分工的发展实现适度的人均增长，第二部分进一步探索物质的生存和再生产之外的行为，在第二部分将更密切地关注“非必需的”消费模式。

## 第二部分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

通过考察了一系列受到广泛承认的，用1800年前西欧的制度来解释这一地区早期开始的工业发展的观点，发现根据最近对其他区域的研究，它们之中没有一种具有说服力。这说明，几乎没有理由认为，1750年前甚至1800年前的西欧比同时代大陆其他各类人。密集区域有更强的生产力。当我们转向土地与劳动的要素市场时，我们发现了令人非常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中国看起来至少与1800年前的西欧同样符合新古典主义的有效经济制度的理论。

### 三、奢侈消费和资本主义的诞生

更多和更少的普通奢侈品

关于1400年以后“奢侈”或“消费者社会”的产生的观点大致分成两类。第一种强调的是巨富阶层中奢侈消费的增长。这些高等的消费模式最终为下层百姓所模仿，这种模仿受到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也创造了集中的市场。它受到了新的自我观念和扩大的社会结构流动性的进一步鼓励，从而不仅使暴发户而且使“中产阶层”甚至某些穷人都能通过适当的消费方式用他们的钱买到社会地位。另一组观点也从社会最高层开始，但放在曾经是奢侈品的东西向中产阶级及最终甚至由穷人消费的日用品的转化。这里，并不令人吃惊的是，重很少放在牢固耐用的奢侈品项目上，而是更多地放在能够以比较小的单位获得，并通常迅速被消费的物品上。尽管这两种现象互有重叠，但那些关注上流社会奢侈消费的人，与那些关注地位较低的百姓和“成瘾性食品”的人相比较，强调的是与工业化的不同联系。

因而这些观点集中注意这些日用品的消费怎样使总需求扩大，这种需求又怎样改变了作为生产者的普通人的行为方式。此外，受其影响的欧洲人作为其他所有各种物品—从谷物到马车到报装生产者的能力也受到影响，但他们自己不生产成瘾性食品。糖、烟草等等通常由奴隶或其他形式的不自由劳动者在欧洲以外生产，不会为了期望这类工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而向他们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生活消费品，这些非欧洲的劳动制度对欧洲历史关系重大，是因为它们增加了成瘾性食品的供应量并压低了它的价格，不是因为它们成为刺激欧洲生产扩张的新动因的实证。另一方面，这些耐用奢侈品中有很多主要是在欧洲生产。只限于那些有足够的流动资本的人，他们买得起昂贵的原料，能支付熟练工人的工资，并能够等待直到那些有势力但常常缺少现金的消费者最终偿付账单；因而，奢侈品生产者的某个子集成为成功的资本家，而其他人逐渐成为工资劳动者。结果是，尽管对上流社会耐用奢侈品消费的讨论可能涉及到整个经济的总需求，它们的焦点却在别的方面增长中的奢侈品市场怎样改变了商品生产方式，促进了新制度的产生和生产者的内部分化。

因而，对成瘾性食品和民众奢侈品的讨论是对上一章提出的问题的回溯，民众对市场的参与、劳动的配置和大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对耐用但较为昂贵的奢侈品的争论，指向了属于第4章中有关资本主义的讨论的主题：公司结构变化；能够提供倍的人对生产的控制加强；相当少的有强烈再投资动机的人进行的利润积累。所以，尽管上流社会的消费至上主义按年代顺序首先出现但从日常奢侈品开始却更具解析意义。

现代早期欧洲和亚洲的日常奢侈品及大众消费

在理论上，我们不应该比较个别商品的消费，而应该比较整个市场菜篮子；在理论上，我们也能知道，偏好相似到足以跨越消费差异对购买力起重要作用的文化背景。但18世纪史料的现实状况意味着我们没有这种自信，所以必须对待下面的比较的含意。我们对相似的须期命的估计和对基本的卡路里在家庭预算中所占相似比重的估计，暗示出其他消费种类的比较对我们更大的计划有定的重要性。

在糖的消费方面，欧洲优势的出现也比人们可以预期的要晚很多。尽管使用奴隶劳动生产出了比较廉价的糖，消费并不是在整个欧洲都呈稳定上升的趋势。在今天欧洲的人均消费使英格兰1800年的人均消费相形见绌看来是不可抗拒的糖“对世界的征服”曾经是有一定限度的，它还能使人在肉体上上瘾占有了所有这一切，欧洲消费增长中一个长达50年的停顿在一个经济普遍好转时期暗示出，设想1850年前＂诞生了"个小可逆转的”消费社会能会是严重的误解。出于同一原因，那种认为其他地方＂奢侈“消费增长有太多停顿的观点，可能是抓住了某种完全正常的东西，却把它当作了一种与一个本应“自然”继续的过程相抵触的反常的东西。其次，上表提醒我们，1850年以前，我们主要是有一次英国革命而不是一次欧洲革命。

耐用消费品和奢侈的物化

对于比较耐用的物品一一家具、银器、亚麻布等等来说，存在一种内生的欧洲优势看起来更为合理。但在这里也有理由小行事，特别是与中国和日本比较由于可用资料的差异，进行这些比较特别困难：举例来说，在亚洲没有与欧洲的遗产清单对等的东西，尽管如此，精英阶层消费的变化，比方说在1400到1800年间，似乎在许多社会中大致相似。在欧洲、中国、日本和印度，人们都发现，室内用具、精致的服装、饮食器具和今天被称之为“收藏品”的东西的数量和品种在最富有的人。中有引人注目的增长，展示物质财产成为一种更重要的确定地位的因素，而同时，要使消费与不由财宫规定的等级身份相符的反复努力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同肘私人侍从作为一种地位象征的重要性下降了，很多旧的上层家庭发现他们没有财力通过消费绯续进行地位竞争。但我们的视野需要超越这类非常普遍的类同之处。

奢侈消费的发展在任意两个社会中都不会完全相同。本书也不可能考查消费内涵在不同社会之间变化的所有方面。对我们来说，有关系的是，为地位竞争而使用商品的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改变在不同社会中相似到足以推动使用量的同样增长。

物品的拥有和交换在很多杜会中都是表现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这使人们轻易地认定，拥有巨额财产的人数的增长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对财产积聚的刺激，这种刺激以前受到骄傲自负的上流社会或疲软的生产力的阻挠，按照这样的表述，对更多奢侈品的期望是永恒并无需解释的，变化的只是生产及收入的分配。

另一方面，可能有人认为早期社会中由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太少因而关系不大，认为现代早期阶段非必需品的消费高潮标志着一种激进的“唯物主义”的新生活方式。这后一种说法，就其把现代的无限需求作为创造的而非天生的现象来对待这一方面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也存在问题。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最严重的是，它可能轻易地不知不觉陷入一种二分法，把社会分为两种，一方面是由“商品”和“市场”决定社会关系，交换被认为是对利益的个人主义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由社会关系调节经济，社会地位决定消费，人们关的是互惠关系。在把这类二分法应用到历史中时，结果往往是在首先成为“唯物主义”的欧洲与地球其余部分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后者由于还没有越过这条界线，不得不从外部引进“商品”、“唯物主义”和“经济人”。

尽管在印度肯定存在“消费至上主义”，但其进展看来可能比在东亚或西欧郪要小。如果我们把“奢侈的物化“视为一种改变，它取代了私人侍从的规模而成为一个人的地位标志，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最晚从16世纪起，在中国和西欧，有人身依附的仆入和佃农的人数都出现了急剧下降，加上上流社会的逐渐城市化，使得维持大批侍从更为困难；尽管日本没有经历类似的法律变化，社会和经济力量却向着同一方向推进。应该注意的是，私人侍从之中地位的衰落，也使上流社会更可能对民众的消费不满。当各种各样的仆人充分融入其主入的家庭中时，至少让比较常露面的仆人穿上华丽服饰成为上流社会家庭证明自己的财产的一个方面，但一日仆人成为地位低下但却独立的人时他们做的任何展示都可能被指责为不合适的甚至危险的出风头户因而在中国、日本和欧洲，指责民众消费的文献汗牛充栋，既表现出经济变革，又表现出这些地方的上层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不再主张直接拥有他们的下人一-从而表现出他们自己在多大程度上逐渐用更多的商品来标志人际地位关系。

### 四、看得见的手: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

海外剥削和资本积累:威廉斯理论的再审视

以非欧洲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许多学者认为，通过奴隶贸易、海上掠夺及类似活动积累的金融资产对于工业革命的资金至关重要；这一观点的埃里克·威廉斯版本是最著名的。

一个少数欧洲至上论者，最著名的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新大陆的矿产、种植园和奴隶贸易给了欧洲重要的能力，使其能够比它自己的生产力所允许的生活得更好、投资更多卢但是大部分人主张这些利益由于三个理由中的至少一个面变得不重要。一些人首先否认高压统治允许平均水平以上的利润。另一些人承认至少存在正常水平以上的利润航可能性，但认为这些利润的积累与欧洲内部经济活动产生的利润积累相比价值不大。其他人则指出一一如我在前文所述一一工业革命初期的资本需求相当小，并认为这使得无论怎样的正常水平以上的利润都可能与工业革命毫不相干。

最后一种观点的正确性一一能够用于固定投资的资本积累在引起一次工业革命中并不是决定性的实际上取决于正在批驳的是什么论据，离开奴隶贸易和新大陆矿业的利润，英国仍然有一些人可以创办棉纺织厂和酿酒厂；一旦棉业革命的利润滚滚而来，甚至铁路所需要的多得多的资本也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观点可能仍然站得住脚。考虑到欧洲各国在供养18世纪不断增长的人。时遇到的很多困难一以及如果必需的产量是通过劳动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进一步扩大而实现，欧洲最终可能走上不同的长期道路（一个我们将在第5章和第6章详细考察的课题）一可资利用的财力资源的削减就可能具有深刻的含义，

海外高压统治看来不可能没有带来超额利润。显然，奴隶贸易、新大陆的矿业、海上掠夺之类行为能够获得惊人的利润，尽管各种各样的失败行动明显拉低了平均回报，这些不断实行的行为仍然成为一些巨额购宫积累的基础。的确，欧洲内部一些平凡的事业同样有利可Ill,但我们完全不清楚，如果"没有强烈的海外高压统治造成的机会，欧洲的财宫拥有者是否还会坚持抽干更多的沼泽，而不是购买更多的名衔、名花或名画，实际上，即使在相当“中产阶级”的英格兰，在其计划书中提到海上掠夺行为的商业投机项目要比没有这类内容的项目更容易吸引上层阶级的投资。下面的说法无疑是对的，

明显因素的重要性:奢侈品需求、资本主义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

欧洲的奢侈品需求、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确实在一个方面起了明显作用，即刺激了新大陆经济增长和非洲的奴隶贸易。但即使在这一领域，推动向新大陆移民的也是欧洲的政治经济与欧，亚两洲，特别是中国需求的一种结合。

尽管有一些殖民者是受宗教和政治的激励，但如果殖民地居民没有发现他们可以在欧洲或亚洲出售的商品，难以令人相信欧洲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会有很大发展。大部分殖民行为是由利润追求者私人提供资金的。很多移民可能想要寻找一片他们叫以在上面相对自给自足的土地，而不是一个他们能够从那里出发参与动荡不安的输出经济的地点。但在1800年以前，白人移民中只有不到1/3是自己筹措路费的，那些实际为移民付款的人感兴趣的是利用移民的劳动创造输出，而不是帮助后者实现自给自足的安定生活的梦想。

此外，如果美洲没有输出如此之多的烟草，糖等等，相对于穷人的储蓄来说已经很高的移民费用还会更高。

国家间的竞争、暴力和国家制度:它们多么不重要又多么重要

本节进一步提出，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代价高昂的长期军事竞争—在造成欧洲独有的海外商业扩张中起的作用可能大于企业家的才十，或是大于对异国商品的好奇本身。此外，还提出欧洲的军事竞争对欧洲经济发展做出的最大积极贡献或许不是通过交战、政府机构官僚化等等影痐欧洲内部经济环境的方式，而是通过把这种竞争扩展到欧洲以外。成果最大的是高压统治最有力的领域，在发展中的大西洋经济中

但是在我们转向欧洲人不断在海外建立政府和互相交战的意义之前，值得探讨一下论述这些活动在欧洲内部之影响的观点。这类观点提出战争对欧洲发展有三种可能的好处：技术外流、需求增长带来的刺激和政府为促进生产增长（从向国家税收增加）而改革其制度的动机

一个史为有力的观点如果成立的话是，战争驱使下产生的特权有利于积累，因为它把财富交到了特别有可能为了最大收益而进行再投资的入手中。在其著作中的一些地方，布罗代尔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强调大家族王国在种类繁多的投资载体之间移动的重要性。但是，即使这些家族王国很重要也无法认为它们创立的所有载体都是必须的；至少这类与政府相关的载体中有一些可能把资本从较为生产性的活动中移走如同简·德夫里斯证明的用于现代欧洲早期发展的许多资本是通过把钱从各种各样提高声望但在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财富出路上移走曲”建立＂。致使欧洲几乎所有国家把更多的官职、包税和头衔放到市场上的军事竞争，是这种转移的一个障碍，而不是助力。

第二部分的结论: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的意义

显然，迟至18世纪中叶，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从发现旧大陆其他很多地方与西欧同样繁荣，并有同样的“原始工业”或“原始资本主义”，直接跳到一些学者提出的非常反事实的断言-某些亚洲社会在满族或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一直在向一次工业突破发展。看起来更可能的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必然会向这样一个突破发展，事实上，甚至在欧洲，18世纪后期的很多经济思想家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未来。

反之，大陆最“充分定居”。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看起来都在向一种共同的“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发展，在这条道路上，即使有稳定增加的劳动力投入，已知最好的生产方法的传播和能够使分工更为有效的商业化的发展，产量也只是勉强领先于人。的增长。现在不可能知道它是合会继续无限期地领先一一产生一个杉原薰称之为“东亚奇迹”的以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持续发展的欧洲副本一或者它是否会落后于人。增长，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尔萨斯绝境。但这些结果中没有一个与实际出现的资本密集、能源密集和吞食土地的“欧洲奇迹“非常相似。纺织品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尽管经常被引证为“工业化”的开端，实质上并不能改变那条道路，因为它没有为一种根本的因境提供解决方法：即，食品、纤维、燃料和建材的生产都在争夺日益稀缺的土地。实际上，到了森林为纤维作物而消失的地步（或者还有更坏的是绵羊，每磅羊毛线需要更多的土地），运输业或重工业更根本的突破所需的能源变得越来越难以得到

因而，与其把16到18世纪其他先进经济看作“没有成功的欧洲”的实例，倒不如把这一阶段的西欧看作一种并不特殊的经济可能更为合理，仅仅是在18世纪后期特别是l9世纪，意料之外的重要的断裂使它能够突破以前限制了所有人视野的能源利用和可用资源的根本制约时，它才成为一种幸运的反常。尽管新能源本身主要来自英国煤开采和利用的一个高潮，我们将在下两章中看到，欧洲利用大量新的矿物衍生能源的能力也要求各种各样新大陆资源的流动。正是通过为这些流动创造前提条件，欧洲的资本主义和军事财政作为一个巨大的全球关联的组成部分—才真正具有了重要意义。

## 第三部分超出斯密和马尔萨斯之外:从生态制约到工业持续发展

### 五、共同的制约：西欧和东亚的生态紧张

中国的森林采伐和地力衰竭：与欧洲的一些比较

中国农村的数据很少，但区域性的资源衰竭常常很严重。在长江三角洲，木材短缺引起了大型建筑和船只价格飞涨，一条海船所需木材的价格在1550到1820年间可能提高了700%(同时稻米价格大概提高了100%)。许多供海外贸易用的平底帆船的建造地点从长江三角洲、福建和广东转移到了东南亚。中国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在尽可能避免燃烧以前作为燃料的木材，改为燃烧农作物残余、草和牲畜粪。确实，由于中国人的高密度，假设中国的生态问题比欧洲的生态问题严重得多是有诱惑力的，但那样做实际上不无危险。

列举中国各地的生态问题：

首先，华南的人均燃料需求可能比法国的低很多，在更温暖的气候中需要的供暖较少，中国人的亨调方法比欧洲人的更快，燃料的效率也更高，与欧洲使用的炉子和（特别是）敞开式的壁炉相比，中国无论是用于亨调还是家庭取暖的火炉设计得都更加有效。在我对广东的计算中我就这些差异作了一些调整，但所用的方法几乎肯定任估了它们的影响。

第二，在中国树木种植和木柴收集的一般模式其特征是每个家庭庭院中或庭院附近的小树丛，加上依靠一片片断续相连的树林的收成意味着运输费用最小。因而，值得花力气捡拾树枝和其他可以燃烧的小块木头，而这些东西在欧洲会被留在树林中的地上浪费棹。

第三在亚热带的岭南，每棵树的年生长量几乎肯定比在法国更大。这一差异可以估算出来并添加到计算中，但我没有这样做，这是又一个确保这些比较一如果有误差的话一一不利于中国而不是欧洲的做法。

第四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农民家庭的燃料供给有很多并非来自树术，而是燃烧农作物残余。所以，在法国变成农田的每公顷森林都是燃料供给总量的一个减少，但在中国加入耕作的土地仍然生产燃料。

最后我们还需要考虑华北。这个缺乏水稻优势，又肩负着支持中国首都（一直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重任的旱作区域相当大。到1900年华北很多地方成为生态灾区一种普遍的倾向是假定这种情形已存在很长时期，凌大燮1700年的数字显示华北的两个省份—山东和河库—林采伐已经非常严重（森林覆盖率分别为J.3½和6.3½)。第三个完全位于华北大区的省份直隶，像部分属于华北的山西一样08.8½),情况要好得多(22.7%),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局势。

华北大区和华西北大区或许有中国最严重的生态问题。由于华西北人稀少，我们在这里将忽略其日益恶化的问题把它们的意义看作地方性的实际上。

因而，总的说来，欧亚大陆的两端都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它们所遇麻烦的任何程度上的差异（仅以国内资源为依据）或许最终都能证明是相当小的。欧洲的大部分优势是由阻止土地密集利用的制度性陪碍留下的闲置资源构成，而不是优越的经济安排造成的逐渐积累。只要我们把自己限于这些区域的内部资源方面，比任何差异看起来都更为重要的是人。增长和原始工业化多么迅速的关闭了可能会使任何地方的经济生活和人蚐资源利用出现更为彻底的变革的生态窗。要使一场工业革命发生并持续下去，或者即使是为了原始工业的增长能持续得更长久，就必须在某些地方找到燃料、纤维或许还有食物的巨大的横财，但是为了理解这些相当突然的横财的充分意义，我们必须首先观察最后一个具有一般相似性的领域。作者说明由于极为有效的（并且通常是劳动密集的）资源利用方式，中国和日本的该区域在寻找缓解土地密集型资源短缺的地方性方法时做得更好；但这些方法远非完善（特别是对木材），它们要依赖其他非地方性资源的输入（例如用东北的豆饼挽救棉田土壤）。总之，欧洲和亚洲的该区域都需要通过与人较为稀少的区域进行远距离贸易获得土地密集型资源。在这种远距离贸易是与旧大陆其他区域进行的双方自愿的贸易的范围内，欧亚大陆两端的区域面对着同等的机会和限制；但是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中国的该区域比它们的西欧对应区域在利用这类贸易方面更为成功。

与旧大陆外围区域的资源贸易：准马尔萨斯问题之斯密型解决方式的共同模式和限制

欧洲（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最终可能获得了某种产生于制度性障碍的“落后的好处”，这种制度性障碍在较早时期阻碍了更为集约地使片土地。但是这些好处在18世纪或19世纪初的技术和制度环境中还不能得到。在当时，那正是农奴解放和公地分配刚刚开始向中东和东欧发展的时候。东欧许多地方的普通人购买的工业品仍然非常少，昂贵的生产资料也仍然罕见。所以，1800年前后东西欧之间的贸易仍然保持着它从17世纪中叶以来的状况，远远不能够满足西欧的需求。因而，在本章开始时描述的生态压力在西欧像在中国和日本一杆仍然未曾解决。这些压力可能完全阻止发展，也可能迫使它走上一条更为劳动密集的“东亚”（或是丹麦）道路而不出现重大突破。最终，生态系统的“落后的好处”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差异，但它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成为可能。在过渡时期，煤业的突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生态缓解方式。

### 六、土地制度的解除：作为一种新外围的美洲

另一个新大陆，另一笔横财：贵金属

墨西哥、秘鲁加上后来的巴西，把数额巨大的贵金属运到了欧洲其中一些来自对殖民地的直接构取，这种流动中一个实际上更大的部分仅是稍微有点间接地依靠高压统治。强制性的劳动定额压低了采矿成本，无论当地人是自己实际完成这种工作还是用贴补别人工资的方法花钱摆脱它，当这些定额的直接受益者是常住新大陆的矿业企业家时，它们明显地提高了在任何特定价格上可能的产量，由于很多人一从大中型矿山的经营者到“实物分成”的矿工本人一都有黄金和白银出售因而无法阻止这些积蓄落入欧洲买主手中。同时，殖民地的立法极大地减少了那些带着欧洲和亚洲商品来交换贵金属的人之间的竞争一一并且至少尽力限制了当地对这些进。商品的替代生产。因而，这种贸易的范围和它的成交价格都被扭曲了，使黄金和白银输出中一个未知的较大的部分成为给欧洲的一件“礼物”。这个“礼物”中有一些留在了西欧。这些金属对欧洲经济发展或许没起什么作用，因为它们为无数的战争提供了经费，包括西班牙对西北欧正在形成的该区经济发起的几乎成功的进攻。尽管如此，这些金属可能帮助欧洲贸易的车轮涂了润滑油，它忙肯定在更有效的军事技术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同时，新大陆的很多珍宝继续东行，把其他商品带给了欧洲。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单独的流向，新大陆黄金和白银输出的一个重要流向是旧大陆形形色色生态富有的小市场地带一一从东南亚到近东各地到东欧使欧洲能够扩大它从这些外围地区的真正的资源输入。在这些场合，白银或黄金（通常较少）的用途类似于现代的通货储备：它们是一种价值差额储备，转让它们是为了弥补与对欧洲商品需求有限的区域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但是也可以把这些通常在从欧洲转手运走之前巴经铸成货币的金属看作一种欧洲制造的商品，在这些地区有相当大的市场，而本地的产量（由于缺少合适的原料）有限，在正在迅速铸币化的经济中（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区）这类制造品至少部分意义上是一种大众通用的商品；在市场化程度最低的外围区域，例如东欧，它实质上是一种奢侈品，无论哪种情况，它都使西欧从这些区域得到的初级产品比没有它时能够得到的数量更多，但是，由于贵金属不会用坏或用完（不像农服或谷物），如果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使用它们，要为它们创造出一个不断膨胀的（或许甚至是持久的）市场是困难的。的确富人可能增加他们的白银或珍宝储藏，但总有一天他们的储藏会足够对付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责任，白银作为一种弓1人注目的消费品，与丝绸瓷器、油画之类相比，肯定会开始失去价值。因而，新大陆的白银帮助西欧获得的原材料要比15世纪的“金银饥荒“延续下来它们能够获得的更多，但白银本身不能使西欧与铸币化程度较低的旧大陆经济之间的贸易无限扩大。

第二个流向也有助于欧洲获得土地密集产品，但不那么直接。这一流动是交换各种各样的亚洲（主要是印度）制造品这些制品在为美洲获取奴隶的成本中又占了很大部分。仅印度棉布就占18世纪英国商人用以交换非洲奴隶的货物价值的大约1/3.可能占法国商人（他们生产印度织物的出色仿制品的工业发展较慢）用来获取奴隶的商品的一半以上。葡萄牙皇室的大量贸易是直接从亚洲到非洲再到巴西，在母国停留仅仅是为了呈送新大陆的商品换句话说，这一部分金属流动推动了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大陆的奴隶区域成为有充裕的劳动和资本但缺乏七地的欧洲的一个霍要补充。

最后，贵金属的第三个流向是数十年中所有流向中最大的，但这一路白银的流动对减轻欧洲的土地压力或许作用最小流向了亚洲人已稠密、商业化高度发展的地区在那里，它被用作一种涉及社会中所有阶级的交易中介，接下来，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又流向了欧洲和美洲本身。这一描述，如我们看到的，可能适用于印度贸易中的一部分，但它首先是指流向中国的白银大潮，在中国数百万的普通人用白银缴纳赋税并用于许许多多日常的购买活动。在这里白银显然是一种货物，面不是用以弥补账目不平衡的价值差额。

尽管如此，新大陆金属的转手确实使西欧得以把它的真实资源的输入扩大到远远超过它在其他情况下能够得到的。为了使旧大陆一些货币化程度较低的外围区域流出的资源不断增加，新大陆的一些白可能必须转换为棉布、瓷器或香料，但由于中国的需求，这种转换也是可以实现的。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新大陆的金属本身、通常用白银交换来的转手的亚洲货物和产自新大陆当地的异国情调的商品（如糖和烟草）合在一起，为西欧从旧大陆其余地区的输入所作的偿付要比全欧洲制造的工业品所作的更多。

所以，一些作者对高压统治掠取的金银和由双方自愿的贸易实现的更为重要的真实资源流动所作的区分看起来是不自然的产不仅生产新大陆输出资源所用的土地和劳动完全是超市场的高压统治的果实，为避开所有引起旧大陆内部该－外围的交换趋向停滞的因素，也需要在整个新大陆采用加勒比海种植园的独特的经营方式和雷商主义政策。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如果没有白银帮助支付殖民地行政管理费用，并供亚洲商品转手运往非洲和美洲之用。很难说清这笔“生态横财＂苍样才能以如此大的数置到达欧洲，也说不清欧洲如何能够从旧大陆其余地区获得它实际获得的生态缓解。

生态缓解的一些度量标准：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

有关联的数字相当多但为了有效地讨论它们，必须对它们作一些分解。为了进行论证，让我们排除掉那些无志及生重要的制度变革就能从旧大陆外叩区域获得的商品（例如毛皮，可以认为俄国能够大量输出），以及日大陆通过引进者如马铃薯（没有它无论爱尔兰还是普鲁士都不能庐英格兰输出谷物）之类新大陆的植物而获得的利益。新大陌庞大的渔业北美的海岸对它很方使但并不霞要这些东西在某种松散的意义上都属于新大陆的横财，但如果我们在计算我们的净值时过于宽泛我们就只是在简单地计算横渡大西洋的贸易量，而没有说明这些交易（更不必说它们背后的任何具体机制）的实质。所以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讨论将几乎完全其中于糖和棉花，连同对19世纪中后期来自美洲的初级产品更大的洪流的一些反思。

即使是这种不充分的原棉供给也高于美国在19世纪初供给的数量；但如我们所见，它也是产生于那时无法想像的努力在没有20世纪的耕作工具的清况下，替代来自这些“新欧洲”的较晚也较大的粮食作物富源，始终是极不可能的，除了欧洲本土、相对稀少的人。和有利的制度结构外，旧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具有类似的、对欧洲粮食栽培更有利的生态综合条件。

比较和计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如果其他更大的因素一一欧洲内部的资本积累、粮食的国内供给或无论什么一一怎么能说某种因素是决定性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对这里的具体事例还是对更为一般的概念化的历史过程都是重要的。

当关注解释单个案例的发展时，那么较小的因素訧是较次要的因素。但即使如此。也产生了范畴问题。

煤和新大陆将有多大的意义，部分地依赖我所指出的其他地方的相似性怎样使读者信服，以及对那些具体现象的证明。至于那些现象本身，我愿提出给它们以特别重视的四个理由， 它们不要求我们去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减轻，欧洲会经历一场马尔萨斯灾难；一种五似于“蝴蝶翅膀产生的观风”的情形，或者设想如果有一个更长时间的生态窗。，印度、中国或日本会发生一场工业革命。有可能发生一场欧洲生态危机，但我们的反事实推论允许我们设想各种各样更为可能的结果这些后果共同用一系列劳动密集对土地压力进行了调整现实中的人在多少相似的环境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方式一一但不会导致任何类似于英"'国的突破，实际上，如我们在最后一节将看到的，即使出现了可以模仿的技术，这些劳动密集的道路仍可能使效法工业革命更为民难，因而，强调我所选择的因素在我看来，是对于最初并不很大的初始差异有可能导致未来大得多的差异这一原理的一个合理的而不是随所欲的援引。

超出这些数字之外的东西

异国风味的商品在这一阶段成为很多普通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可能通过重要的尽管无法度量的方式，对劳动时间从为家庭应也用而生产到为市场而生产的重新配置起了作用，而后者又对欧洲通过扩大分工取得“内生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对新大陆以及被弄到那里工作的非洲人的剥削所起的作用看来可能在许多方面大于我们的虚拟土地数字反映出来的作用。把所有的指标合并考虑，看来可能的是，与欧洲内部的市场、家庭体系或其他制度的运作产生的假定高于旧大陆其他该地区的优势柜比，这种剥削对于区分欧洲与其他那些该区有更大的意义。在把西欧与至少是东亚的该地区区分开来封，一个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因素看来只存在三种候选。一个是欧洲生态自相矛盾的“落后的好处”，它留下了未开发的资源，从而为19世纪提供了生态喘息余地，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好处并没有扩展到英国（或低地国家）或扩展到一些至关重要的商品（尤其是纤维作物和木材），它们被生态劣势抵消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英国煤矿幸运的地理位置及其与整个煤／蒸汽综合体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工业革新浪潮自身某种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的现象，并且如我们所见，它有更大的意义是由于它与丰宫的煤及新大陆对其他资源限制造成的缓解结合在一起。

在本书最后节中，我在两个方面继续穷究这一决定性的分流观念。我首先论证了新大陆对丁欧洲进入19世纪后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简雯勾画这些动因怎样随着工业革命向英国之外扩散而改变和继续。最后，回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些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迫采用日益劳动密集的方法对付生态压力，并在不同程度上发现这些调整使以后实现资本密集与能源密集的工业化更为困难。

进入一个工业世界

到那时，也出现了新大陆的生产者想要从欧洲得到的机械类（与人力相对）生产资料，至少出现一些对设计的专利保护同时，廉价的运输、机械化的生产和欧洲移民带来的品味，意味着欧洲现在也能够在新大陆出售大量的生活必需品。随着资本和劳动不仅以工业品的间接形式，而且以移民和投资的直接形式大量流入，土地富裕、市场导向的美国成为人。日益稠密、工业日益发展的欧洲的一个理想的补充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变化。

最后的比较：劳动密集、资工业的“成长”

当煤、蒸汽和机械化打开了巨大的新技术的潜能时，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处在一个可以使它们资本化的独有的位置上。新大陆大量未开发的资源（及地下资源）就在它们的面前伸展，实际上消除了土地的制约。此外，它们在新大陆已经获得的东西意味着它们进入19世纪时的生活水平比它们在没有新大陆的情况下应该达到的水平更高，它们有加强了的军事能力（这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强迫开放市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利用垄断），手工业的规模比它们在其他情况下能够维持的规模更为广阔。最早的人正是来自于这些原始工业工人，而不是直接从农民阶级中诞生。

在一个长时期中，中国和日本像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一样，也找到了保持它们的原始工业不断发展的方法，尽管没有一个新大陆为它们提供必须的纤维和其他土地密集品的输入。这些过程还包括可以缓解该地区对土地的地方性压力的某种贸易（和渔业）的扩张；但与欧洲解决方法相比，它们需要它们自己的农业部门更强烈的密集和更大的扩张，特别是纤维生产，到18世纪末，这一过程看起来以逐渐降低的速度和相当大的生态代价在继续日本人。在1750年停止了增长，而尽管中国的人。继续增长了一百年，原始工业人的百分比却可能是停滞甚至下降的。很可能中国仅有的有过大规模原始工业的地区实际上经历了逆工业化过程。而真正发生的情况是，中国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所占人。百分比在1850年比在1750年大了很多长江三角洲上经济最发达的府1750年约占中国人的16%-21%。

尽管在以农业为主的大区中有一些正在发展更多的原始工业，它们在1750年以后人。增长中所占的巨大比重意味看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850年至少与1750年同样是一个农业国，1950年也同样如此。此外，分散在内地农村中，通常被扰为一个理想的农业家庭组成部分的原始1业工人，不像与土地脱离联系的无产阶级那样能够方便地转移到设想的工厂中去。因而，在1750年之后的大约两百年中，对于沿着比较容易的”成长’道路实现工业化，中国日益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上，不得不设法应付从农业中直接吸收它的大部分工厂工人造成的所有问题。

为什么其他方面并无异常的西欧该地区取得了独一无二的突破，并成为19世纪新世界经济的有特权的中，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供养飞速发展时，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该占据重要地位。我们进行地区间比较的漫长的旅程至少为我们以之开始的方法论问题带来了一些解答：它说明，与其说我们有理由追寻工业化前夜真正独立的实体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我们更应该了解先前已存在的关联在使这些差异产生时起的重要作用。